

DENGXIAOMANGJIANGYANLU



邓晓芒

哲学与生命

讲
演
录

邓晓芒 / 著

邓晓芒

讲 演 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晓芒讲演录/邓晓芒著. —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445-1996-0

I. ①邓… II. ①邓…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3885 号

邓晓芒讲演录

著 者:邓晓芒

责任编辑:张中良

封面设计:尹小光

出版发行:长春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431-88561180

总编室电话:0431-88563443

邮购零售电话:0431-88561177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130061

网 址:www.ccchs.net

制 版:馨元工作室

印 刷: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263 千字

印 张:17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4000 册

定 价:3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431-84519908

自序

这本书中所收入的是我近两三年来给大学生、研究生和社会大众所做的十几次讲演。之所以取名为“哲学与生命”，是因为我对我的哲学思考的一种看法，即我的哲学不是教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它与我对生命的思考，乃至我本人的生命历程都有密切的甚至是同一性的关系。自从四十年前，当我最初决心自学哲学的时候，我就已经把我的生命视为一种哲学的生命了，也就是说，从此我的一切生命活动都要围绕着哲学思考而旋转，我就是为哲学而生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本书中所涉及的面如此地广泛，包括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中西文化比较、企业文化、教育问题、文学问题、女性问题、翻译问题、思维方法问题等等，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哲学问题。哲学不是一门“专业”，哲学是全部生活。

当然也有我的倾向性。我认为，我的这种倾向性不是我个人气质的倾向性，而是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倾向性。我觉得，一个人，只要他认真地体验生活，不用一些先入之见来自欺，他就会感觉到这种倾向性。这就是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那些病态现象追根溯源，并发现它们与我们民族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某种文化基因有关，因而升起一种反思和批判这种传统基因的欲望。的确，一个社会，如果从中央到底层民众都在齐心协力、年复一年地呼吁清除那些腐败因素，但腐败却不仅毫发无损，而且愈演愈烈，让所有的人都束手无策，那么这就不单纯是受到什么外来的影响或被什么东西所腐蚀的问题了，而要到我们民族的某种劣根性中去找原因。这就是我多年来提出“新批判主义”、大力提倡文化自我批判的缘故。但我没有料到的是，竟然会有那么多的知识精英站出来反对我的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明如白昼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却都是居

心叵测的编造。但他们对我的反驳并不建立在任何站得住脚的理论分析上，通常都是用一些空洞的大帽子压人。他们远离当代中国的现实，对数千年已逝的亡灵却情有独钟，他们生活在自己幻想出来的理想世界中而丧失了对真正生活的体验能力。这很让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失望，觉得这帮人都是一群无所作为的人，他们只会抢话筒，抢到之后就以气势压人，他们除了一股“气”之外，还有什么？由此也想到，中国文人士大夫几千年来恐怕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在社会上起的作用，主要就是维护“祖宗之法”。每当有这样的机会，他们总是显得那么理直气壮，谁要有一点点离经叛道的嫌疑，则群起而攻之，交口而伐之，争相而表白之。所以中国历代的改革者从来没有好下场，不但生前备遭攻讦，身败名裂，甚至死后还要挫骨扬灰，遗臭万年。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还没有产生，或者正处于艰难的萌芽过程中。即使是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现在看来大多数也不过是一群建言献策的士大夫，他们渴望的是如何能够攀附某种政治力量来将自己的最新国策和权谋付之于实现，以完成自己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因此一旦得手，他们骨子里头那种传统士大夫的奴性便原形毕露，这就是半个世纪来我们所看到的所谓中国知识分子被“打断了脊梁”的现象。他们所献之策是否被最高当局采纳其实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要表现出自己的一腔忠心，至少是决无二心。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奴性人格不但使他们自己、也使中华民族深受其苦，他们不是被打断了脊梁骨，而是天生就缺少一条脊梁骨，他们是依附于“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多年来我的各种著述和讲演，其实都有一个根本性的宗旨，就是通过学术研究和建立在学术研究上的文化批判，为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建立自己的独立人格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我认为，虽然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也都在呼唤一种独立人格的诞生，但由于很少有人对这种独立人格需要有什么样的生存条件作深入的考察，也由于传统习惯性的思维方式的潜在影响，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或者道家特立独行者的人生哲学来作为现代独立知识分子人格的安身立命之处，这种偷梁换柱的思维方式一开始就为他们在遇到强大政治压力之时的人格崩溃埋下了隐患。我的反思则是在全面检讨了中国知识分子近百年来的心路历程之后，力图重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一种尝试。

这种重建不是恢复失落了的记忆，不是重蹈覆辙，而是改弦更张，是重新开拓。这种重新开拓虽然从西方文化和哲学中吸收了理论上的诸多观念，但本质上是基于我自己在这一个大起大落的时代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之上的；最终是基于我对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之上的。这种思考也可以说是一种重新思考，它的前提是批判某些东西和推翻某些东西。因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在这方面提供了无数天经地义的教条，这些教条长期以来牢牢禁锢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使得他们每当思考人生的问题时，都不由自主地滑入既定的思路，得出既定的结论。而彻底颠覆这种思路和结论的，就是我本人对死亡的直面和沉思。关于“死”的思想使我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在这种震撼面前，一切励志的高调和豪言壮语都成了散落的碎片，将我还原到彻底孤独的真实。我意识到，如果不从这种生存的真相出发，我所建立的任何冠冕堂皇的人格理论都是经不起现实的拷问、也经不起理论的追究的。为此，我对西方哲学中有关死亡的理论有种特别的兴趣，我感到所谓死亡哲学实际上才是真正的人生哲学，是最彻底最到位的人生哲学，因为它不做作、不虚伪，而是肯定了人的有限性，并且是在人生的边界上来反思整个人生的意义，它最能够吻合我所经受到的死亡震撼。只有对死亡的彻悟才能使一个人变得高贵，才能使人生走出猥琐。

我们中国人通常认为，直接讨论死亡的问题表明了一个人的消极情绪，甚至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我们从来不讨论什么是死的问题，我们只讨论“为什么而死”的问题，死得是否“值得”的问题。因为什么是死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谁死”的问题，它是最个人化的问题，比生的问题更加个人化。人的诞生肯定牵涉到父亲母亲，但人的死则只关乎个人。我们之所以不讨论死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从来不思考个人，从来没有独立的个人。我们即使考虑个人，也只是从与他人的关系中来考虑，在这种关系中，真正的个人始终是隐藏着的，个人的人格、个人的尊严、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隐藏着的。人变成了外在的、肉体的人，他被紧紧束缚在与他人、与外部世界的物质关系中。死亡哲学则给人打开了一个内心的纯精神的世界，给人的肉体生活赋予了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意义。

因此，当我在大学生讲坛上发表这样的“怪论”时，我发现年轻人的眼睛里面都放出了异样的光芒。谁说死亡哲学是一种消极的哲学？它

既不“虚无”，也不“绝望”，而是踏着虚无和绝望的底线奋力一跃。它恰好是一种经得起虚无和绝望的生命哲学，而那些通常耳熟能详的中国传统生命哲学，反倒是在虚无和绝望面前一触即溃的东西（儒家），或者本身就是一种虚无主义和绝望情绪的表现（道家）。鲁迅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没有人能说鲁迅是消极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要么在历史提供给他们的大舞台上忸怩作态，自以为又是一位国家的栋梁、旷世的忠臣，眼睛始终盯着上面，渴望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机会；要么自降身份，干些狗苟蝇营的勾当来骗得大众的仰视和名利的光环，还自以为得计，觉得自己才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这些人都是些骨子里的虚无主义者，他们那些表面上振振有词的理论，都不足以撑起一个真正独立的人格。我为他们感到悲哀，并且惋惜，因为他们毕竟比一般人有较高的智商，却没有把自己的聪明用到恰当的地方。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更年轻的一代人身上，他们生活在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现实生活对他们的教育使他们更加不容易被忽悠，即便是还很幼稚，他们也更加喜欢用自己的眼光去评判、去探索。我相信，到他们正式踏入社会生活充当自己的角色时，我对他们说过的话可能会有些用得着的地方。我期待这一点。

邓晓芒

2011年7月6日于珞珈山

目录

自序	1
一 哲学与生命	1
二 哲学启蒙	18
三 我们时代的生与死、爱与惧	53
四 西方哲学的特点	92
五 西方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107
六 康德哲学对中国启蒙的意义	139
七 康德哲学与企业文化	148
八 当代中国教育的病根	164
九 文学中的思想性	190
十 社会公正视野下的性别问题	214
十一 哲学史方法论讲座	232
附录 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审视	258

一 哲学与生命*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下午好！

我本来的想法是小范围内找几个朋友聊一聊，没料到搞成这么大一个规模。不过我还是稍微做了一点准备，想跟大家谈一下我做哲学这些年来的一些感想和体会。多年以前有记者来采访我，说你能不能谈谈你在学习哲学过程中的一些“事迹”。我说我没有什么事迹，我又不是什么模范，也不是什么标兵，我只有普通人的一些生活，实际上是很平淡的。为什么想起来要学哲学？因为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贫乏的年代，尤其是精神生活上非常的贫乏。在60年代，我那个时候是1964年下乡，初中毕业当知青，那个时候下乡呢，可以说是满腔热情，不像我们今天回顾起来的时候那么样悲惨兮兮的，应该说很有激情。16岁的年纪，而且我们那一代人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都受的是正统的教育，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跟今天的愤青差不多，当年如果有网络的话，我就是愤青，而且比谁都“愤”。那个时候号召下农村，当时学校提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就是不能升学就下农村，我是积极响应的。那时候的心可以说是一片赤诚，上面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上面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当年学雷锋啊，学毛主席的“老三篇”啊，背得滚瓜烂熟，脑子里面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一张白纸，谁愿意在上面画什么那就是什么。下乡以后就开始经历了很多坎坷，首先是“过关”，劳动关啊，贫下中农关啊，阶级斗争关啊，一个一个的关过，上面都有人来考验。后来呢，“文革”来了，“文革”来了我们也是积极地投入，可以说是疯狂地投入，几乎不要命了。当时中央“文革”号召大家“文攻武卫”，造

* 2011年3月24日晚，作者在武汉大学教五楼多功能报告厅所作讲演的讲稿。

反派要掌握枪杆子，我们当时也就去武装部抢了枪，但是，拿了枪以后不知道干什么。拿了枪以后你对谁？你准备打谁？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考虑过。反正上面说要掌握枪杆子，于是就掌握了，掌握了又怎么样呢？只好拿着枪东躲西藏，生怕被别人发现了，好像是别人掌握了枪，我们反倒是被瞄准的对象一样，到处躲。最后一枪未发，老老实实交还给当地驻军。到了运动的后期，我们又被打成“专政对象”，挨过贫下中农的批斗。所以要从表面的事迹来列举的话，我和所有的人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文革”过来的人大都有我这样的经历。因为那个时代是个普遍疯狂的时代，“文化大革命”。但是，真正的思考就在那个时代开始，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开始想问题，那也是想问题的时候，十八九岁，二十来岁。我就觉得为什么我没有自己的观点，老是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跟着到处乱跑？甚至于把命都豁出去，有的人确实丢了命，丢了命还不知道怎么丢的。我还没有丢，算是万幸了，但是为什么像个没头苍蝇似的转来转去？当时就想到要有自己的思想，开始看一些书，很朦胧的想法。最开始还有几个同道，我们一起来读书。后来这些同道一个个迫于生计都离开了，最后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坚持读书。在农村当了十年知青，回城以后又当了几年搬运工，算起来，从“文革”后期的1968年到1978年，也读了十年书。再后来就是改革开放，考大学，考取了武汉大学西方哲学的研究生。

这段经历说简单很简单，要说复杂也很复杂，就是在一片狂热之后，冷静下来以后觉得自己应该学点儿东西。但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想到要学点儿东西，周围的人几乎没有谁想到要学点儿东西？当时大家纷纷想到的是要谋生，学一门手艺，比如说学木匠的有，学裁缝的有，学泥瓦匠的有，学电机的也有，要学一门技术，然后在社会上能够吃得开，至少自己能够维持生活。我当时什么也没有学，我就是在农村整整干了十年的农活，完全是干农活。为什么当时就没有考虑到像别人一样去学一门技术，而是想到要看书呢？现在回想起来这里头可能还是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我为什么想到要学哲学，而且紧紧地抱住不放，我想这可能跟我小时候的某种境遇有点儿关系。

我小的时候，从未想过要搞哲学。那时也有些朦胧的想法，写作文写“我的理想”，想当科学家。后来有一段时候想过当画家，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哲学家。也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哲学。有的人看到我现在搞

哲学，以为你一定是遇到高人了，一定是有人教了你什么东西，很多人以为哲学是“教出来”的，其实不是，哲学是“活出来”的。中国人通常不明白这一点，以为一切智慧、一切学问都是“学”出来的、“问”出来的。我们特别崇尚这个“学”字，从孔子开始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还有“教”，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就是文献，圣贤书，周易尚书春秋，古代经典。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其中“传不习乎？”传下来的知识、传统你是不是温习了，“温故而知新”。“行”就是行为规范，礼貌礼节。“忠”和“信”，我有时觉得很奇怪，一个人的忠信是可以“教”的吗？“信”嘛还勉强说得过去，做人要讲信用；这个“忠”嘛恐怕不是能够教的，如果是“教”出来的忠，那还不是真正的忠。你内心是否忠，这个是很难确认的，所以我对这一点始终抱有一点儿怀疑。中国人从来相信教育是无所不能的，包括你的忠，包括你的心是不是“诚”，都是可以教出来的。比如一个人心本来很不诚，但可以教得很诚。这个恐怕有一点问题，至今我们还相信这一点。比如说，今天我们贪官污吏很多，于是呢，领导发话了，要对贪官进行“教育”。贪官很多都是五十多岁了，你还要对他进行“教育”？能教好吗？而且他们这五十多年来不都是处在教育中，不都是教出来的吗？难道他们没有被教过？他们还天天在教别人，你教的那些东西和他们教别人的那些东西有什么不同吗？再者，由谁来教育他们？由更大的贪官吗？这种教育无非是“以吏为师”。教什么呢？教人服从啊！中国所有的教育都是教人服从，而不是教人运用自己的理性。一个人服服帖帖，上面说什么信什么，说话做事不超出上面规定的范围，这就是教育“好”了，否则就是教育的“失败”。至于所教的东西是不是可信，甚至教育者自己是不是信，这无关紧要。教的内容可以是“善意的谎言”，也可以是三字经，把自己丢弃了的“糟粕”又捡回来。这样的教育，是越教越忠，还是越教越伪？

那么我们今天的道德滑坡，几乎崩溃了，人们都认为是教育出了问题。其实我认为是我们的生活出了问题，是人们的活法出了问题。比如说从马加爵到药家鑫，他们是没有教育吗？应该说从小学到大学他们都在受教育，他们都是中国教育的产物，也许现在的青年，每个人心里都隐藏着一个马加爵或药家鑫。为什么教不好？我们的教育只要求他们表面服从，做假样子，至于心里怎么想，当然也想要控制，可惜控制不

了。你想教他知识可以，教他技能也可以，唯独你想教他“忠”，教他心里只能怎么想而不能怎么想，这一点恐怕难以做到。一时做到了，马上暴露出来是假的。所以我觉得不是教育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生活的问题。传统的活法倒的确是教出来的。古代的“学”有两种，一种是“小学”一种是“大学”。“小学”就是讲文字训诂音韵，“大学”就是讲做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什么叫“止于至善”，朱熹的解释是“尽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就是教你不要有私心，一切服从天理，要真心诚意地遵从天理。这就是“做人”的道理。那么，现在的活法是不是教出来的呢？我觉得真正能够适应当代现实生活的那种活法是不可教的，是教不出来的。现在看来，我们以前教人怎么“做人”，类似于驯兽。有的人很会做人，但兽性未改，到时候就会爆发出来，没有底线。但现代生活再也没法用驯兽的方式来教人了，那些鞭子和锁链都已经不起作用了，包括心灵的鞭子和锁链。今天的活法必须每个人自己去悟，一个适合于自己又适合自己的环境的活法，自己又满意、觉得这才是做人的活法，是每个人自己悟出来的。就是说，如果你还想做一个人，而不是一头动物，一头牲口，你应该怎么做；如果你今天还不想自杀，你应该怎么做，这个要靠自己去悟。那么这种悟，最根本的是悟到生死，是参透生死，这就是死亡哲学。

尤其是死亡哲学，尤其是参透死亡，我们中国人不太讲这个，这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是学不到的。中国人不讲死亡哲学，孔子只讲“未知生焉知死”。你先要把生的问题把握住，死的问题到死了再说，首先要知生。什么叫知生，就是学会适应既定的一整套社会秩序。一切社会规范都是别人已经定好了的，尤其是先人、圣王、文武周公已经定好了的。你不遵守就不是人，是禽兽。这就是学会做人，我们通常学会做人就是这样，如果既定的社会规范你不遵守的话，那你就是禽兽。我们经常关于中国传统道德的争论中会碰到这种情况，辩论到最后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就说：“你连这个都不懂，你就是禽兽”。到这里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再讨论下去就是找骂了。但是，如果我怕挨骂于是就只好接受了这套规范，那么很明显，这种被强迫的“忠”归根结底是假的，总有一天这套规范会被我全盘抛弃，甘做禽兽。终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今天就到了这么一天了，那一套东西我们都受过教育了，但是我们甘愿做禽兽。我就是禽兽，又怎么样呢？有何不可呢？看透了，人本来就是动物

嘛！当然一般人比较掩饰一点，我心里面想做禽兽，但是有个前提，不要让人家知道了。只要别人不知道，那么我做禽兽都可以的。药家鑫大概就是这样想的。他撞了人，要让人家不知道，只好把人家干脆杀了，自己不承认就是了。这叫一不做，二不休，而且他心安理得，他第一次撞了人、把人杀了，第二次又撞了人，他又准备跑。就是说，一旦他这个道德底线被突破，他就甘于做禽兽。那是谁也拦不住的，他也没有任何愧疚。当然现在想起来后悔了，现在他面临死刑了。而当时他是没有任何愧疚的，当他杀人的时候，连续捅了八刀，每一刀都是要下决心才捅得下去的，要咬着牙才能捅得下去的啊！那么这个底线，如果我们不推究一下，你再多的教育，你告诉他很多很多规矩，你告诉他道德规矩、法律规矩，你“普法”，你把法律让他都背熟了，哪怕他是法律专业出身的，都没有用。因为这样一种教人做人的方式，这种教法，没有到底。什么是底？就是他本来立足于禽兽，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他本来是个动物嘛，那么你要顺着他，在他是个动物的基础上你再让他去选择。小孩子能够说话了，懂得一点儿事了，你就要让他去选择，真正的教育应该是这样。我们通常理解的教育好像是把一套规矩教给你，我认为那是没有什么用的，即使暂时奏效也是虚假的。

我们现在把这套既定的规范从小就套在孩子们头上，叫做“从娃娃抓起”，让小孩子在不懂事的时候把它背熟，使人长大了就像自动机一样按照那些东西去做，这是与这个时代背道而驰的。正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有不同的活法，可以选择，没有绝对的权威。以前那种教，它也只是一种活法，我们也应该承认，在以前它是起过作用的，但是今天有各种不同的活法可以选择，也不至于让人沦为禽兽。以前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当然是禽兽的活法。那个时代没有选择，要么做儒家，要么做禽兽。清朝的时候外国人和中国人打交道，我们说他们“无君无父禽兽也”，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也没有变成禽兽，好像很多方面比我们还更文明。所以现在有了选择，哪种活法更可取，要看哪种活法更合乎人性，更合乎我自己的本性，更能让人活。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像《三字经》、《弟子规》这样一些东西是不能让人活的。钱文忠在百家讲坛讲《三字经》，讲《弟子规》，连他都讲，这些东西你要拿到社会上去，是不能活的，是“要吃亏”的。吃亏当然是轻描淡写了，实际上是要吃大亏的。那么，不能活为什么还要

讲？这些东西在过去让人变成活死人，在今天让人活不了，为什么还要宣扬？无非是自欺欺人而已。今天真正让人活的活法是参透了生死的活法，是直面死亡的活法，它把人逼到禽兽的边缘、生死的边缘，然后让人自己选择，来确立自己的生活原则。我们讲到过去的活法，像孔子那样的活法是回避死亡问题的，当然也讲到死，但都是背对着死来讲，用活着时候的现成规范去衡量死亡，而没有直面死亡。今天我们还在讲“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重于泰山，轻于鸿毛”，都是用既定的生的规范去给死归类。比如说我“无愧于什么什么”，我“死而无憾”，还是面朝着活的这一面，但是没有转过脸去面对死亡。面对死亡是什么呢？你真正面对死亡你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在死亡面前都等于零。而现在唯一不等于零的现实是什么呢？是我还活着。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个立足点，那确实就是禽兽，你既然把所有的东西都摧毁了，那这种活着不就是一种动物式的活着吗？那么在这种沦为动物式的禽兽的活着的边缘上面，我们再让人去选择，我觉得真正的教育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通常理解的教育是把人教成一个成品，我们当老师的都想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实不对的。人类灵魂哪能当一项“工程”来搞？人的思想也好，道德也好，哲学也好，都是活出来的，都是在生死存亡的边上，在动物和人之间的边缘上，人选择要做一个人。我仅仅是“活着”是不够的，我要活出我自己的人格来。那么这一点我们的青少年也好，成人也好，通常都是没有上过这一课的。西方人很早就讲这个死亡哲学，比如说我经常举的例子，瑞典的小学生有一门课叫做“死亡课”，由老师带着到医院的太平间去看死人，去摸死人，去感受他们的体温。而且要他们谈自己的感想，人死了都是一样的，在太平间都是一样的，不管生前你当的是什么官，什么大款，什么名人，都一样。现在韩国人好像也在搞这一套东西，有死亡体验馆，每个人都可以进去，躺到棺材里面去试一试，去体验一下有什么感觉。中国人通常是不兴搞这一套的，觉得“晦气”。当时瑞典的死亡课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主播赵忠祥就发表感慨，说我不赞成这样搞，那么小的小孩子就让他看这些恐怖的事情不合适，摧残幼小的心灵。但是，就我来说，正是由于对生死问题的关注，使我开始对哲学感兴趣。当然首先是对自己的活法感兴趣，想要搞清楚我这一套活法是怎么来的，根据何在。我彻底反思了自己所受的教育，发现一切都在欺骗，它让我处处碰壁，让我所有的理想

都破灭了。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真诚后面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基础上的。今天的愤青们和我当年一样，没有反思自己的基础。他们的出发点总是“我们从小被教育应该怎么做”，似乎只要是从小被教育的，就是天经地义的，否则就会对不起一大群人。他们长大了又照样教育他们的子女。他们失去了对自己从小怎么被教育加以反思的兴趣。

但是我本人很幸运的是，小时候比较早地就思考了死亡的问题，我在6岁的时候，自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人都是要死的，那么我也要死吗？于是一切就失色了。本来玩得好好的，天地万物，五彩缤纷，突然间天地都成了黑白的了。我就问我母亲，是不是人都要死啊？她说是的。我说那你也要死吗？她说我也要死。我说那怎么办呢？她不做声。我说医生能不能救我呢？那时候很相信医生，我小时候多病，有病医生都给我治好了。我母亲说，医生也不行。那就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我就说我不想死，我妈也不做声。然后我就哭，哭也没用，你去哭去。那一棒，当头一棒，大概有一个多月没有缓过气来，每天晚上做噩梦，梦见“死”，非常恐怖，常常晚上满头大汗做噩梦醒过来。可见我还是比较执着的，6岁的时候就想这个问题，而且不断地想。那么后来我是怎么缓过气来，走出死的阴影的呢？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我只有自己救自己，怎么救？长大一定当个科学家，发明一种不死的药，第一个给自己吃！下了这个决心以后，于是就睡得很安稳了：长大一定要当科学家！为什么我刚才说我的理想是要当科学家呢？长大一定要发明一种不死之药，一定能够发明出来的。于是我的心理就达到了一种平衡。当然我后来既没有当成科学家，也没有发明不死的药，这种想法却一直在心底里埋藏着。为什么后来，我下乡以后，那么样的努力，以及“文革”以后，那样要学习，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力的冲动，就是觉得人要活着，总是要有一种精神支柱，要做点儿有意义的事，如果没有精神支柱，那人活着就跟死了差不多，那只是死得早还是迟的区别问题。早一点儿死跟迟一点儿死没有什么区别，无非都是死，死了以后就都一样了。你多活20年、30年、50年，又能怎么样呢？你还是死了，你那个不死的药还是找不着啊！当然这个时候我已经抛弃那个不死之药的幻想了，我知道已经没有那种药了。但是，所激发起来的那种求生的要求，鼓励着我不甘堕落。如果就这样下去了，当时有的知青指着那些在田里面拔猪草的老太婆说，我们将来就是这样了，就觉得很不甘心。

当然其实也没有什么，全中国的人都是这样，那个时候是说全中国有 8 亿人口，其中 80% 都是农民，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没什么了不起。这样想当然也可以给人一种安慰，我跟大家一样，没有什么特殊，有一种从众的心理，就准备在农村一辈子了。但是还是有一点儿不甘心的就是，我毕竟读了一点儿书，在思想上还应该有一点儿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早年、儿童时代对死亡和思考，对我的一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不是每时每刻都浮现到脑海里面来，但是一想到这个，内心里面就有一种颤动，全身心直到最底层的颤动，就觉得我不能这样，我必须努力，我必须活！虽然人生天地间，生命是有限的，但是要考虑无限的东西，不能够仅仅停留在有限的东西上面，要寻求让自己活得更多，更值得，与无限更加接近。要考虑死和不死的问题，考虑不朽的意义问题，要寻找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不死之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坎坷，年纪轻轻就下放到一个没有文化的地方，极不“对口”。我在农村转了三四个地方，一下转到这个农村，不如意了又转到另外一个农村，后来回城又当临时工，又搞搬运，又打零工，相当于今天的农民工吧，这些都对我研究哲学有很大的帮助，有生活的底蕴。但真正促使我对哲学感兴趣的主要还不是这个，而是一种死亡意识，一种正在迈向死亡的紧迫感。既然人要死，所以就要好好地珍惜自己的生命。当你意识到人随时随地有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头上，你随时有可能死掉，那么你对自己的生命就会有一种珍重，对别人的生命也会有一种珍重。你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重，你就会知道别人也会是这样。而我自己对生命的看重就表现在，意识到人生只有这一次，不能白活了，既然到人世上来走了一趟，就不能白白地来了一趟。什么叫做白白地走一趟？你生下来过早夭折了，这就白生了；再一个你活得像个动物，也是白来了。人跟动物不一样。西方人讲，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你如果像动物一样地活着，你只活了一半，通常我们只活了野兽那一半，另外那一半你没有活过，你本来是可以活的，那是你的权利，很可惜。精神生活是你的权利，但是你放弃了，到死的时候就会后悔。许多发财的人，包括贪官，都希望自己的后代子女不再像自己那样，要提高精神层次和学历，把他们送到最好的学校读书，送到国外去深造，能够造就出个把拿诺贝尔奖的更好，用强大的经济后盾去支持他。要是他们没有

子女，或者子女不争气，他们死的时候会后悔。但是，为什么不在有生之年，自己去提高精神层次呢？

悟到人生必死，这纯粹是个人的事，不是别人能够教你的。在中国，没有人能够教你悟到死。悟到死当然就会带来恐惧，带来痛苦，甚至带来心理的毛病，特别是小孩子，也许会引起心理疾病。那就需要疏通了，在国外就需要心理医生，那些小孩子上死亡课就相当于种痘，提高免疫力。但是正因此也会带来升华。既然你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且很宝贵，你就会想到，要用有限的人生活得更多，多到什么程度？那是无止境的，你要向无限去努力。西方人有句格言叫：“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人所固有的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无限的天地，因为我只有一个人，但是人类所具有的我应该都具有，至少有这种可能性，要把人类曾经拥有过的一切精神财富尽收眼底。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就是虽然我现在很有限，在农村里干农活，看不到任何前途，但是我应该把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一切有兴趣的东西全部纳入自己的视野。所以我拼命地看书，没有界限，文学也好，哲学也好，历史也好，经济学的也好，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书，只要是印出来的写成字的，拿到手就着迷地看。在这一过程中我就体会到了全人类的活法，与其他人类发生情感上的共鸣或碰撞。所以我看了那么多的小说，就是为了要多活，就是看别人是怎么活过来的，把他们的活法变成自己的经历。我常常讲到，你把一篇长篇小说好好读完，你就活了两辈子，因为那是人家一辈子的结晶。人家一辈子的精华都在那里面，那么如果你真正看懂了，你投入进去了，你把它吃透了，你岂不是活了两辈子吗？所以我认为我的读书也好，思考也好，都不是什么很痛苦的事情，而是很有兴趣的生活。很多人不理解，他们以为，你那样的十年都过来了，是怎么“熬”过来的啊？一定很痛苦，一定很压抑吧？你发奋图强，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毅力可佳啊！这些人都不理解我，我不是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处境才焕发出力量，我是追求一种阅读的快乐，我在看书的时候虽然很艰难，但是很快乐，因为我发现我又找到了一种新的活法。包括那些哲学家们写的东西，非常难读，像康德、黑格尔这些人的书，非常难读。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高的活法，我一定要把它拿下来，一定要把它变成自己的，这样才不枉自来人间一趟。所以我是由此才关注起哲学来的。如果说哲学生涯的话，那就是从对生命的追